

偷密码的人

第一章

神秘来信

1985年仲夏,旧金山的约翰·彼得森和比尔·斯密茨已经知悉内情。在华盛顿看过全部文件的为数寥寥的几个人或许也能了解它的意义。但是由于没有证据,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把它公布于众。

卓越的科学家可以用严谨的数学方法证明,美国的军事密码——天才的设计思想与当代最强大的计算机相结合的产物,是坚不可摧、不可破译的。只要没有充分的证据,谁想提出不同的看法,那他注定要白费心机,很快会成为工于心计的钻营者的嘲弄对象。听听他们的评论吧:立即销毁;偏执狂;动机是好的,但想入非非;爱走极端;登峰造极的麦卡锡主义;此事再次说明,严加管理是多么重要。

所以,知情人都保持着沉默。然而他们知道真相,美国的国家安全处于致命的紧急关头。

抓住第一条线索应归功于珍妮特·福尼埃。若是稍有疏忽,这一良机就会失之交臂。

从幼年起,珍妮特·福尼埃做事就认真负责。她在得克萨斯州的阿瓦隆长大,那是一个只有300多人的小农庄。她就学的高中毕业班里只有9名学生。她祖父是一个保长,父亲是警察,后来是治安官。作为得克萨斯州的一名执法官,她父亲克尽职守,以至电影导演强行把他拉去,在警匪影片《波妮与克莱特》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

珍妮特想学父亲的榜样,大学二年级时退学,在达拉斯

加入了联邦调查局,担任一名打字员。在那里她出挑成一个风姿绰约的女郎,碧眼金发,体态丰满。同事们喜欢呆在她的办公室里直到下班,让她帮助改正拼写错误,修改语法不通的语句,还让她出面接待来客。

她忠实可靠、工作勤奋,不久就晋升为秘书。1976年,她得到一项美差,被派往美国驻巴黎大使馆任职。她掌握了法语,学会了兑制美酒和制作点心,还能担任美术馆和博物馆的导游。她还学习了一些密码知识,会使用法律专员的密码机。

在法国的四年任职结束后,联邦调查局列出美国的一些城市供她挑选,她选择了旧金山。1980年8月,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自动组织起来帮她搬进新居。后来,她与其中一人——特工皮埃尔·福尼埃喜结良缘。

珍妮特从秘书提升为反间谍调查助理后,主管投诉科。她不得不客客气气地回绝心理变态者打来的下流电话,耐心倾听酒鬼的胡言乱语,安慰那些絮絮叨叨的寡妇,她们打来电话只是为了寻求同情。除此以外,她还得处理许多来自精神不正常的人的署名或匿名信件,其中有些人给从前的配偶、邻居或者同事捏造了可怕的罪名,还有一些人来信告发的罪行或阴谋纯属虚构。

其实,所有的匿名信件,即便是前后一致的匿名信,大可归入“难处理”文件,将其束之高阁。联邦调查局长期积累的经验证明,匿名信件极少含有货真价实的情报。那些身份可靠、头脑清晰的人们所提供的线索,要比不着边际的线索有价值得多。处理信件的人,即便漏掉偶尔藏在信中的重要情报,也极不可能被复查出来。如果有人要求复查,结果又证明是徒劳无益的,那他就会被认为是判断力低下。

然而,珍妮特记得在达拉斯工作的日子里,李·哈维·奥

斯瓦特在刺杀约翰·肯尼迪总统前不久给那里的联邦调查局写了一封恐吓信，他们对此信却置若罔闻，不加理睬。因此，无论投诉科的工作是多么繁琐乏味，她还是一丝不苟，认真处理。

1984年5月11日，珍妮特拆开了一封打字匿名信，信封上写道：加州旧金山金门大街450号联邦调查局负责官员收。她反复读了两遍，努力说服自己，这封信应归到“难处理”文件。这个间谍小说看得太多，以致于幻想自己变成了间谍。他想让我们出丑，如果我对它信以为真，岂不太蠢……

很快，她否定了所有这些想法，乘电梯从联邦大楼的7楼下到6楼，快步经过装有防弹玻璃的接待室，穿过一扇电子控制门，走进苏联科。她在那里找到了特工约翰·彼得森，把信交给他，说：“我觉得这件事很值得研究。”

“好吧，珍妮特，”彼得森回答说，“吃过午饭，我就来处理这件事。”

“不，约翰，”珍妮特带着一种柔软的南方口音恳求说，“你还是现在就看看这封信吧。”

彼得森开始时是站着读这封信的，过了一会儿就坐了下来。信的全文如下：

亲爱的先生：

我卷入间谍活动已经好几年了，具体地说，我传送过用于军事通信的绝密的密钥表，还有同样性质的技术手册、情报电文和等等。

我在从事这种活动几年之后才知道这些东西是交给苏联的。从那时起，我追悔莫及，很想洗手不干。最后，我决定不再提供材料，我的联络人并不知道我的这个决定。刚开始的时候，有人就告诉我，我不能不经批准就退出，并对我进行威胁。

在那以后，我认为这些威胁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

不管怎么说，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想给你们一个机会来破获一个可能是非常重要的间谍网。（我还知道我的联络人至少还发展了另外三个人，他们都在积极活动 提供高度机密的材料。）（我的联络人对我很信任。）

我把材料交给我的联络人（他是美国人），他再交给海外的一个联络人（真实情况我不清楚，那个人或许是克格勃）。情况也并非都是这样，有时在美国境内交接。在美国有一个常用的接头地点，用来接受指示和经费。

要是你们对这件事有兴趣，可以在《洛杉矶时报》的“私人信函”专栏里以一则广告向我发出信息。我希望得到的合作是，你们不再对我起诉，绝对不要公开我的身份。从现在开始4个星期内，我将在每个星期一的专栏里寻找你们的广告。还有，我还需要一些钱，其数量取决于我中断正常生计的时间的长短。

广告用RUS开头，接着是你们想传递的任何信息。如果你们的信息不够明确，我将再次写信。如果我决定合作，我会通过律师转达。不然的话，一切都不再会发生。

真诚的

RUS

珍妮特一直等着彼得森读完这封信。彼得森站了起来，向珍妮特伸出手，说：“谢谢你，我这就立案。”

彼得森把这个案子交给了他最信赖的人——他自己。他很快起草了一封给RUS的回信，又把这封回信附加在向联邦调查局总部报告刊登此事的密码电报之后。彼得森并没有申请批准发表这一回信和开展调查。他只是简单地告诉总部，旧

金山分局将按照“UACB”惯例自行其事。UACB的意思是指“除非得到总部相反的指示”。这条惯例是官僚机构中一条不太礼貌然而却很有效的手法。华盛顿的头目可以不加任何解释否决一项申请，然而却不能不把自己的姓名和理由记录在案就取消一项正在进行的调查。

反间谍检查官比尔·斯密茨那天外出了，指定彼得森代理。因此，从技术手续上讲，彼得森具有处理各种事情的权限。最为稳妥的方式是，耐心等待几个小时，请示上司后再立案，而不是急着给华盛顿发电。但他刻不容缓，当机立断。对他这种作法，真正了解他的人是不会惊讶的。

约翰·彼得森看上去是一个温文尔雅、衣着讲究、彬彬有礼的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但他胆识过人。他是一位内科医生的儿子，在加州的斯托克顿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他本可以依靠父亲的收入读完大学。十二三岁时，他看了《硫磺沙滩》这部影片，约翰·韦恩在其中扮演了一位英勇无私的海军陆战队中士。从那以后，彼得森知道了自己的愿望：成为一名像中士那样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彼得森刚满17岁的那年夏天，他父亲带领全家周游了欧洲，然后又到了苏联。离开苏联时，约翰的愿望更强烈了。1966年初，他在大学刚上了一个学期，就去问海军陆战队的征兵人员能否招收他到越南前线当一名步兵。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当场报名参军。那时他才18岁。

在越南13个月的战斗更加深了他投身海军陆战队时抱定的信念。如果不是他的排长对他说，要想在军队或别的什么地方得到提升，就必须接受高等教育，那么，他还会再次应征入伍的。

1969年，他在圣胡塞大学上一年级时，加州各大学的校

园里经常爆发大规模的反战示威。他先后到 14 个警察部门申请工作,以便合法地同示威者战斗。尽管他参加过实战,体格健壮,然而所有的部门都无一例外地将他拒之门外,因为他身高只有 5.7 英尺,这在他们看来是太矮了。

他很信赖一位教授,原先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教授对他说,特工人员身高最少为 5.7 英尺。彼得森接受了他的忠告,在萨克拉门托作为一名职员加入了联邦调查局。他晚上坚持学习。1972 年取得学位后,联邦调查局把他培养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的特工,送他到越语学校进修一年,接着分配他做反间谍工作。就像在海军陆战队和大学中一样,彼得森一直在寻求着最好的战斗方式。

1984 年 5 月 11 日这天夜里,彼得森在办公室里呆了很久,他不断地抽烟、喝咖啡,在屋里走来走去以便振作精神。浓重的夜雾环绕着大楼,笼罩着下面的街区。他心中暗想,不知金门桥还能不能通行。他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封神秘来信,分析着每一句话,试图找到写信人的蛛丝马迹。他作出一些初步判断。

信封上盖着萨克拉门托的邮戳。根据这一点以及他选择旧金山分局投寄这封信的情况来看,他可能住在北加利福尼亚。

密钥表和技术手册是密码学的特有术语。彼得森之所以能理解这些术语的含意,是因为他在当职员期间接触过联邦调查局的密码机。因此,RUS 声称他传递过密码材料,这很可能是真实的。

只有屈指可数的文职人员能接触秘密的军事通信系统,所以这位深藏不露的投书人很可能是一个军人。

然而,彼得森在这里遇到了一个矛盾。信中说“中断”

生计,这表明他没有军人的那种稳定的收入。

在“等等”之前多用了“和”字,滥用标点符号,拼音错误,措辞不当,内容不条理,这一切都说明写信人的文化水平不高。RUS也可能不是军官。

RUS称他从事间谍活动已经“好几年了”,一直不知道是为苏联效力。在彼得森看来,“好几年”意味着六年、七年,甚至更长。

从参加间谍活动长短来看,如果RUS是军人的话,那他就是一个老兵油子,而不是一个刚入伍的新兵蛋子。

这封信是原打字信的复印件。要想根据复印信件找到那部打字机,这在科学上几乎是不可能的。RUS懂得一些鬼花招儿。彼得森的猜测最后得到了化验室的证实,信上没有留下指纹。

虽然彼得森还想从这封信中得出更多的判断,但到了午夜时分终于放弃了这种努力。他太累了,无法进行敏锐的推理,第二天清早他还要向伯爵汇报。

至于为什么把比尔·斯密茨称作伯爵,众说不一。有人说是因为他的长相类似一位伯爵——身高6.2英尺,挺拔修长,一头浓密的灰发,一副贵族面孔,双目炯炯有神,时而令人生畏,时而使人振奋。还有人说这个称号是由于他的作派而得,许多人认为他气度不凡,心怀成见的人则说他自高自大。

不少人对斯密茨怀有偏见。被公认持偏袒态度的彼得森对那些人的中伤逐一加以反驳。他们既不能讲流利的俄语,也不能讲流利的德语,更没有得到过学位。他们的博士论文没有被评为研究苏联偷窃西方技术情况的最有价值的成果之一。批评者中没有一个人办过一件象样的案子,没有抓到过一个大间谍,没有发展过一个苏联人,没有擒获一个叛国分子。几

个月前，彼得森向一个新来的特工介绍说：“伯爵从不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他全靠着自己的努力获得了今天的职位。”

第一天一早，彼得森来到了位于拐角处的斯密茨的办公室。这里看上去就像一个大学生的单身宿舍，总是推到考试结束时才加以整理，里面到处乱堆着图表、字典、百科全书、文件和各种报告，墙上甚至还挂有一张身穿比基尼泳装的美貌女郎的大幅照片，上面题写着：“祝班上的小伙子们圣诞节愉快！露露。”计算机周围是唯一整洁之处，斯密茨在这里消磨了不少光阴。

斯密茨明白彼得森若不因为紧急事件决不会急匆匆闯进门来，他接过信马上就读了起来。放下信后，他问道：“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是珍妮特发现的。”

“跟她谈谈，告诉她不要对任何人讲。”斯密茨吩咐说，“如果那个人再来信，让她直接交给你，要是你不在，就直接交给我。”他还告诉秘书回绝电话和来访，关起门来研究那封信。

到了中午，斯密茨中止了长久的沉思，邀请彼得森到马克·霍普金斯饭馆去吃午饭，这使彼得森颇感意外。斯密茨不喜欢午餐时间太长，宁愿啃着三明治在公园里下棋，或者在办公桌旁看报纸，何况那家老牌的霍普金斯饭馆位于诺布山顶，需要步行近二十分钟，全都是上坡。

到了那里之后，斯密茨把彼得森领进位于门厅的酒吧间，这又使彼得森吃了一惊。这是一个镶着茶色玻璃的圆顶大厅，里面只有两名女士在喝咖啡。他们走到位于角落里的沙发座位前，坐了下来。斯密茨向一位身穿紧身裙、玲珑可爱的女招待要了一种用爱尔兰威士忌与奶油混合调制的怪味饮料。可这是一种酒，斯密茨几乎不喝含酒精的饮料。彼得森要了一

杯“安柯·斯蒂姆”牌啤酒。他心中猜测，这位上司在搞秘密庆祝，大概是想起了从前在马克饭馆里认识的一位情人。

事实上，斯密茨正在庆祝他认为是职业生涯中最重大的案件的到来。他的职业生涯以保密通信、密码技术和破译密码为发端，充满着大的案件。斯密茨早年厌倦了大学生活，于是应征入伍，在陆军当了一名列兵。由于他的智力测验得分格外高，上级就分配他去做情报工作，他接受了全面的俄语训练，被派往德国。在以后两年里，他侦收苏联无线电通信，学会了如何保护密码和破译密码。从陆军复员并上完大学之后，他加入联邦调查局成了一名特工人员，向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讲授了两年半的俄语。几年后，他被派往波恩担任法律专员，再次使用密码机和密码材料。

彼得森看出 RUS 来信的意义非同小可。斯密茨根据长年累积的密码经验，意识到此事的后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用于维护、修理密码机的技术手册详细地描述了密码机的元件、线路和逻辑。一旦苏联情报机关克格勃从 RUS 那里得到了技术手册，那么他们的专家就可以复制出美国的密码机。密钥表实际上就是密码，每天一换。如果苏联人既搞到了密码机，又弄到了密钥表，那么就可以解读美国的绝密通信，如同美国人一样容易。

从 RUS 来信的字里行间，斯密茨隐隐约约看出了一个典型间谍网的轮廓，这个间谍网受到一个间谍头子——“联络人”的操纵。这个头子担任中间人，从像 RUS 那样的小间谍手中取得情报，然后再转交给买主——苏联人。他本人不需要直接接触机密。他可以从事任何职业的人，有充分的理由自由旅行。向他提供情报的人用不着与苏联人会面，因而绝没有暴露的危险。他把东西藏到很远的隐蔽地点——“交接点”，同时

在那里领取经费和指示。他与克格勃人员之间几乎没有直接会面的必要。当有必要会面时，地点一般是在像墨西哥或奥地利那样的国家，联邦调查局对此鞭长莫及。

在斯密茨看来，这套间谍手法是最基本的，早已司空见惯；苏联人玩弄这种把戏已有 60 多年的历史。然而，直到目前为止，克格勃在美国境内的活动都只是涉及到某个单独活动的美国人。自从侦破偷窃英美原子弹机密的间谍网以来，联邦调查局还没有遇到一个完整的苏联间谍网。

如果 RUS 的来信是可信的，尽管他声称洗手不干，这个间谍网的其余成员仍在逍遥法外，并且积极地活动。危险并未消失，它显而易见，迫在眉睫。由于他们的情报来自多个方面，可以互相证实，所以危险性就更大。

“RUS 究竟是什么人？”斯密茨既是向他自己、也向彼得森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仔细地倾听了彼得森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和推理。“当然，上述一切都是猜想，”彼得森最后说，“可能我的所有说法都是错的。”

“不幸的是，你大概在每一点上都是对的，”斯密茨回答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在和一个小人国的家伙打交道。他出卖国家长达数年，现在他又想出卖自己的同伙。这些全都是为了他自己。他装作一种忏悔的模样，一点也不想由于自己的罪恶受到半点惩罚。他想让我们忘掉他的叛国罪行，替他打掩护，使他良心得得到安慰。他想让我们说：‘谢谢你，伙计。你干得不错。从今以后，你可以心安理得，过幸福的生活啦！对了，你可以尽情享用克格勃给你的金钱。’不光这些，这个混蛋还想让我们付给他一笔赎罪金！他是一个恶棍，不讲任何道德。他现在还是个危险人物，很明显，他仍在起着作

用。”

“这么说，你认为这封信是真实的？”彼得森问。

“我们有更多的理由相信它是真实的，”斯密茨回答说。
“我们不妨去听听迈伦的看法。要想法使这个家伙亮相。”

他们在楼下咖啡馆里吃了奶酪夹心面包，开始往回走。联邦大楼东部和北部是这座城市的良莠混杂区，高雅的老式公寓、豪华的新式建筑、五颜六色的小咖啡馆比比可见，中间混杂着按摩室、同性恋舞厅、色情商店和下流酒吧。

他们向前走着。一个在街角处瞎逛的人向他们叫道：“喂，伙计，有零钱吗？我饿坏了，想吃一顿奶酪通心粉。”他看上去面色白净，身体健壮，神志清醒，不到 30 岁。

“谁信你的鬼话！”斯密茨怒斥一声。

那个流浪汉畏畏缩缩退了回去，嘴里嘟哝着：“哼，我知道你们想干什么。”

再往前走，一个身披麻袋片的老酒鬼把一只肮脏的手伸到他们面前，无声地乞讨着。他一脸白色的络腮胡，面皮浮肿，嘴角拖着长长的口水，露出几颗稀落的黄牙。斯密茨给了他 5 个美元。

“你疯了？”

“他无力养活自己，那个家伙却能。”

忽然，彼得森低声说了一句：“这群混蛋！”他急步走到斯密茨前面，解开茄克衫的扣子，准备随时抽出肩枪套里的左转身枪。

这时，马路的拐角处有八九个青年正向他们两人扑来。他们身穿肮脏不堪的紧身裤，大敞着怀，戴着项链、手镯和耳环，头发胡乱地梳成辮子。一个个目光呆滞，显然是刚吸过毒，一副精神错乱的样子。这群歹徒丧失了一切理智和恐惧，什么

事都能干得出来。

“约翰，克制一点儿。”

彼得森屹立在人行道中央，手插在上衣里，怒目而视，毫不退让。这帮家伙一哄而散，从两边走过，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群从淫窝里爬出来的狗东西！”彼得森低声骂了一句。

“还是考虑一下 RUS 吧，”斯密茨一面系好上衣扣子，一面说道，“以后再收拾这帮家伙。”

默里·迈伦是国内研究心理语言学的先驱之一。心理语言学，可以说是一种通过分析人的语言和写作来判断人的心理特征的学科。尽管它还没有得到广泛承认，但迈伦的分析对于联邦调查局确实有过很大的帮助，有些颇具先见之明。斯密茨对迈伦的人格和学问深信不疑，下午就把这封神秘来信的复印件寄给了他。迈伦的工作地点是纽约罗彻斯特心理语言分析中心。

1984 年 5 月 21 日，星期一。《洛杉矶时报》广告栏里出现了一个寥寥数语的广告：

“RUS：正在考虑你的建议。工作日上午 9 至 11 时请拨电话 415/626-2793，或者写信给 ME，SF。”

这部电话是在彼得森办公桌上新安装的一部电话。一旦有人拨通这个号码，就立即对他进行追踪。可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二，电话铃一直没有响。彼得森反而有点儿希望它永远不会响。如果这则广告没有引起反应，那就有充分的理由断定 RUS 是个冒牌货，他的信是一个骗局，所谓的危险完全是虚构的。彼得森甚至向斯密茨谈了这种可能性。斯密茨很奇怪地看着他，就像一位教授看着一位一时陷入糊涂的高才生。

无论如何，这种很有希望的猜测在 5 月 23 日上午变成

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珍妮特一眼就认出了那封信，因为信封上的内容同上次的一模一样。珍妮特先等了几分钟，使自己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她拿着它通过电子门，穿过一个两边都是小办公室的狭长的走廊，来到了一个摆着许多办公桌的宽大房间，这里很像是一家报社的新闻编辑室。最后，她在一个小房间里找到了彼得森，把信交给他，说：“我想你正在等这封信。”

“太好了，你为什么没有拆开？”

“也许它很重要，也许我没有必要知道信的内容。”

彼得森急忙打开抽屉，找出一副外科手术用的手套，费了很大劲戴到手上。他揭开信封，把信复印了两份，一份留给自己，另一份交给斯密茨，把原件放进保险柜。

在斯密茨的办公室里，这两个人一起研究这封信。

亲爱的先生：

今天看到了你们的便条，很受鼓舞。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没有打电话。我诚挚地希望能和某个人（像你这样的人）谈谈我的处境，但又感到我无法相信任何形式的个人接触——包括打电话。我现在还没有寻找律师。我们该怎样进行呢，或者具体地说，我该怎么办呢？

我将会坦白一切。我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下决心写出第一封信。是的，我很后悔，觉得应当站出来帮助破获这个间谍网，洗刷我的罪过，使自己问心无愧。不过，我也有很多顾虑：出卖‘朋友’总是于心不忍，担心卷入一场说不清的官司，你们可能公开宣布我参加间谍活动，在起诉问题上突然变卦（如果说已经保证免于起诉的话）。

我想你们已经和上级机关及别的部门讨论过。我不知道我的情况严重到什么地步，是不是要开展调查，能不能给我应

有的宽容(如免于起诉等等)。

我这就打算去找律师来研究我的问题。对我说来,找律师也不容易。我会继续盯着《洛杉矶时报》的星期一版,看看你们是否还有另外的话语或指示。

像我这种处境的人,如果能同某个掌握权利的人秘密交谈,同时也不会被逮捕,那就太好了。

今后几个月里,我的联络人还期待着从我这里得到更多的材料。如果我拒绝的话,不知道他会怎么样。那时我就要向他交底(假定和你们没有达成协议),对他说我不干这种‘买卖’了。以后,我就按自己的想法生活下去。再提供一些情况:他干这种‘买卖’已有 20 多年了,还想继续干下去。他自认为他的组织很严密,除非运气不好,根本不用担心被抓住。不过,他认为这方面也不会出事。我同意他的估价。

为什么没有向他透露我想自首的想法,如果可能的话,甚至也劝他这么做呢?这种做法无疑是愚蠢的,会损坏我的健康。

真诚的

RUS

“他干这种‘买卖’已有 20 多年了”——这句话吸引了他们的视线。在现代谍报工作中,极少能有长时期活动而不被发现,甚至不被察觉的间谍,更不用说一个竟能活动长达 20 年之久的间谍网了。如果苏联人能够解读美国的秘密通信,那么由此得到的情报的数量将是惊人的,处理这些信息需要数百名苏联密码分析人员全力以赴,夜以继日地工作。随着岁月流逝,人员不可避免要更换,知道苏联能破开美国密码电报的人的数量就会成倍增长。

在过去 20 年里,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英国和法国

情报部门都发展过克格勃高级官员，让他们在莫斯科总部或苏联驻外使馆作间谍工作，也有一些克格勃官员出人意料地逃往西方。然而，综合他们从多方面提供的大量的有价值的情报来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存在 RUS 所说的活动。

1983 年叛逃到美国的一位克格勃上校曾透露，当时克格勃正在采取一项重大的行动，其重要性在它的全球活动中居于首位，但他自己对此行动的性质一无所知。他只能提出怀疑，推测有两名军官参加了这次行动，因而这两人先后从校级军官晋升为将级军官，很引人注目。两人都曾在华盛顿任职。从表面上看来，这两个人都没有什么异乎寻常的表现，联邦调查局把他们列入了行政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的名单。

这样庞大的行动，这样长的时间，克格勃怎么可能如此严密地掩盖起来呢？

斯密茨大声说出了他心中的答案：“这肯定是十六处的勾当。不错，正是十六处。”他又问彼得森：“你跟斯坦谈过十六处的情况吗？”

彼得森摇了摇头。

斯坦是指斯坦尼斯拉夫·列夫琴柯，1979 年底从东京叛逃到美国的克格勃少校。斯密茨空闲时喜欢同他谈论本行的专业，根据列夫琴柯提供的情况从苏联的角度观察间谍工作，也喜欢说起列夫琴柯已经遗忘或者从未被人问起的细枝末节。他们在过去曾说到过十六处的情况，这个处专门负责策反外国的密码通信人员。

列夫琴柯解释说，第十六处是克格勃两个最机密的单位之一，另一个单位负责暗杀行动。克格勃把十六处的官员安放在莫斯科，极力躲开外国反间谍机关的侦察，所有涉及密码的案件都由总部直接指挥。如果一位官员确有必要到国外与提

供情报的人接头，那么会面地点就选在某个中立国家或者是苏联认为安全的某个第三世界国家。即便如此，克格勃还可能从莫斯科的监视局派出一个精明强干的小组来保护这次接头。在总部，每个官员只负责一个案子，有关的行动记录锁在只有他一个人能打开的保险柜里，保险柜放在只有他一个人能进的办公室里。

这种保密与职能分离法则同样也适用于外勤工作。如果为了十六处活动的需要，从其它部门调来一个官员负责交接点事宜，那么他便不再担负任何其它秘密任务。他将小心谨慎地利用使馆里的身份作掩护，不干任何足以引起反谍报部门怀疑的事。在同事眼里，他甚至是无所事事，每年至多有两、三次偷偷溜出去到交接点送货和取货。

斯密茨叙述了列夫琴柯提供的情况，最后说：“你瞧，这完全是可能的。”

彼得森问道：“RUS 说他自己干了好几年。他怎么知道接头人已经干了 20 多年了？”

“我想是接头人自己告诉他的。”

“可能是接头人在说谎或者吹牛皮。也可能是 RUS 在说谎或者吹牛皮。”

“这都有可能。不过，这两封信在逻辑上前后一致，令人担忧。”

斯密茨指出，在第一封信里，RUS 说联络人很信任他；在第二封信里，他把联络人称为“朋友”。从这两封信看，RUS 对于这个间谍网的情况与活动方式很了解，除非是联络人的密友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一个训练有素的克格勃官员决不会出现这样的保密差错。因此，这个联络人正如 RUS 所说，很可能是个美国人。